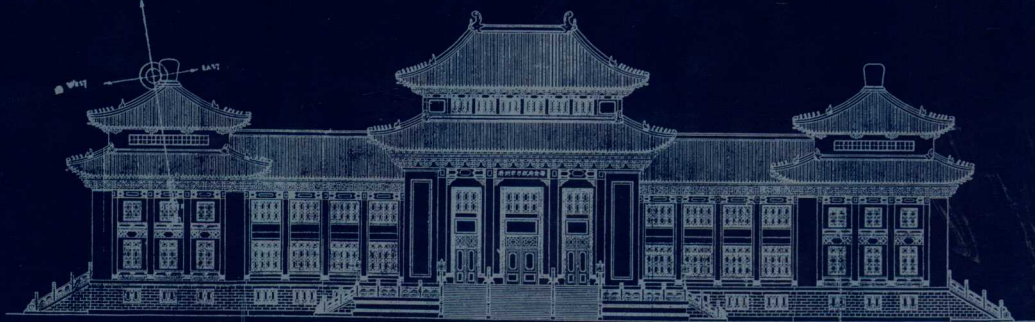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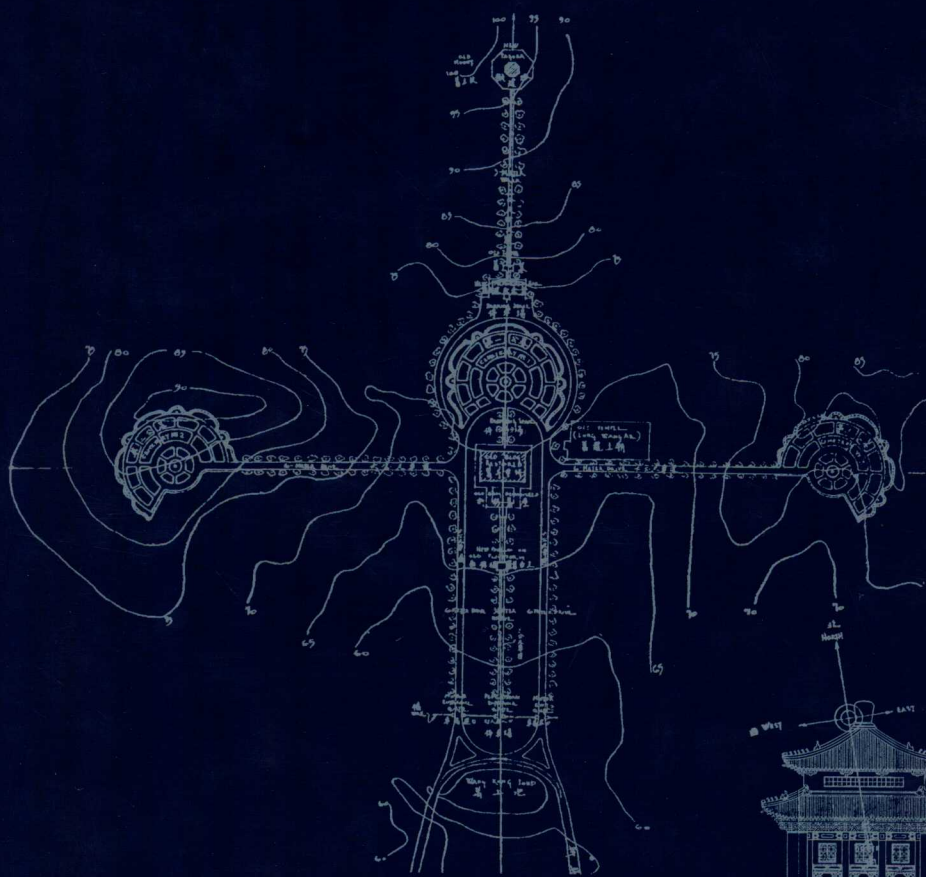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建筑经典丛书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建筑文化考察组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
编著



“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家重点图书

中国近现代建筑经典丛书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1 八十年纪念建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 建筑文化考察组等编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618-4212-6

I. ①辛… II. ①建… III. ①辛亥革命—纪念建筑—介绍 IV. ①TU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4476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邮购部: 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260mm×350mm
印 张 63.5
字 数 569千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
定 价 38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中国近现代建筑经典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单霁翔 罗哲文 吴良镛 周干峙 谢辰生 郑孝燮 傅熹年 马国馨 彭一刚 郑时龄
齐 康 张锦秋 戴复东 程泰宁 何镜堂 杨永生 刘景樑 张宪文 陈谦平 刘叙杰
王景慧 刘先觉 周治良 费 麟 邹德侖 路秉杰 李家俊 陈 骏 付清远

主 任： 龚 良 朱小地 高 志

副 主 任： 伍 江 沈海宁 苏桂芬 蒋祖烜 和红星 崔 愷 路 红 孟建民 庄惟敏 张 宇 邵韦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建	马 晓	马震聰	尹 冰	尹海林	方 海	王 辉	王兴科	王志勇	王其亨
王宝林	王建国	王珍珍	王贵祥	兰希志	叶 青	伍 江	刘 军	刘 谓	刘伯英
刘克诚	刘若梅	刘临安	刘燕辉	刘谨胜	刘江峰	朱小地	孙一民	孙宗列	庄惟敏
朱文一	朱光亚	邢 光	吴志强	张 宇	张 颀	张天洁	张玉坤	张立方	张伶伶
张俊杰	李先逵	李兴钢	李秉奇	李华东	李 沉	杨 欢	杨 瑛	苏桂芬	沈海宁
邵韦平	邹 容	陆元鼎	陈 飞	陈玉环	陈同滨	周 恺	周学鹰	和红星	孟建民
季也清	金 磊	侯卫东	胡 越	赵 敏	赵元超	洪再生	倪 阳	徐 峰	徐苏斌
徐维平	桂学文	殷力欣	贾 珺	郭卫兵	钱 方	顾大风	高 志	崔 彤	崔 愷
常 青	曹兵武	梅洪元	龚 良	傅绍辉	彭长歆	蒋祖烜	韩振平	赖德霖	路 红
熊中元	薄宏涛	薛 明							

主 编： 金 磊

本卷执行主编： 殷力欣

执行编委： 赖德霖 马 晓 周学鹰 彭长歆 陈 飞 邹 容

撰 文： 周学鹰 赖德霖 殷力欣 彭长歆 陈 飞 湖湘地理工作室 张天洁 金 磊 刘江峰 李媛丽
鄢增华 苏艳萍

摄 影： 陈 鹤 殷力欣 刘锦标 马 晓 周学鹰 金 研 朱辉峰 马金辉 李林冬 赖德霖
彭长歆 金 磊 付忠庆 陈立群 等

建筑测绘： 马 晓 汤国华 郑力鹏 等

历史图片提供：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摄影中心 殷力欣 陈 飞 赖德霖 彭长歆 邹 容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等

装帧设计： 安 毅

执行编辑： 苗 淼 郭 颖 王燕嵩 刘晓姗 冯 娟 王 坤 何 捷

序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汉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五千年中华民族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富强民主现代中国的伟大历史事件。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即将迎来其一百周年纪念日之际，由《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建筑文化考察组等单位策划组织编著《辛亥革命纪念建筑》的书稿送来审阅，并邀我作序。我仔细阅读了这数十万言的书稿和相关的建筑测图及珍贵照片资料，认为此书诚为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特定历史阶段建筑现象的开先河之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研究成果，很值得向业内外读者推荐。在此，我谨做如下感言。

1. 围绕着辛亥革命，涌现了一大批见证重大历史事件，纪念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行者的建筑物，如武汉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原晚清湖北省咨议局）、南京中华民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南京中山陵、灵谷寺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广州市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公墓、长沙黄兴墓、蔡锷墓等数百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文化艺术价值的建筑精品，堪称近现代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也尤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海峡两岸人民的喜爱。从建筑历史学的角度看，这一历史时期的建筑现象，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变化、发展趋势，已成为反映社会变革缘由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之一。

2. 有关以辛亥革命为中心事件的晚清至抗日战争前夜这一历史时期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事件研究，比较建筑文化遗产的其他项目（如古代建筑、古代墓葬遗址等）而言，应该说是起步较晚的，而其所面临的具体内容是相当繁重的。目前各地文物部门在这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数以千计的各地建筑遗址、遗存的普查。此次《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在各地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以“见证物性质的史迹建筑”、“本期建筑活动与作品”为基本分类，从文化类型和建筑学体系方面入手，对现存实例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其文化价值作出了客观评价，为今后加强保护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 自晚清以来，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为使中华民族由封建帝制走向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历经坎坷、屡仆屡战，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涉及一个古老民族在全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中所不能回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本书虽以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历史研究为论述范围，但能以较宏观的视野，及时吸收国内外历史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将建筑活动与建筑作品还原到历史时代背景中，从而阐释了这一时期建筑的社会文化价值，极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建筑遗产的发展，一如民族复兴的大趋势

一样,必须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重生之路。

4. 从该书的编撰体例和治学风格上看,各具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围绕这一个课题,分别从文化史、建筑史和社会发展史诸角度,采集史料(文献资料、建筑测绘资料和口述资料)、甄别史料,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比较和对历史发展逻辑的演绎等方面,都下了深入且扎实的工夫。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在理性归纳及学术研究过程中,字里行间洋溢着为建筑文化遗产与辛亥革命伟大实践竭尽全力的激情。

5. 历史地看,由于建筑文化考察组从事这一专项考察研究总结、著述工作才仅仅四年,受认知水平、时间和其他条件制约,其研究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重要地区的建筑实例难全涉及。我认为辛亥建筑乃至中国近现代建筑遗产的大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分阶段实施,但这些绝不能成为我们对这部优秀著作作出评价的阻碍。因此,我向读者郑重推荐这部书,并希望以这个研究成果为起点,日后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文化事业的新需求,包括海峡两岸四地及各国侨民在内的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而在这个划时代的百年文化建设中,客观、公正地评价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历史功勋和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终将成为建筑界、文博界乃至历史文化界的奋斗方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赞同几年来金磊总编及其建筑文化考察组对“事件建筑学”的界定与关注,尤其认为他们矢志不移地围绕在中国近现代史所展开的一系列“大事件”背后的建筑考察是十分有价值的。本书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经典丛书”的第三部著作,在继《中山纪念建筑》(2009年)、《抗战纪念建筑》(2010年)连续出版之后,又适时问世,无疑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及建筑遗产专项研究独辟蹊径的补充,它记录下了亿万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付出的艰苦努力,更说明使事件建筑上升到建筑遗产的传播与出版工作是自觉的文化坚守之举,是这批中青年学者探寻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方向、重育历史心境、传承建筑遗产文明的奉献之举。

单霁翔

国家文物局局长

2011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1	辛亥时代建筑概述 / 殷力欣
23	民国之门——湖北咨议局旧址 / 陈飞、李媛丽
55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的建筑特色及启示 / 周学鹰、鄢增华、苏艳萍
83	纪念与继承——辛亥时代广州的纪念物、纪念建筑及空间生产 / 彭长歆
113	寻访长沙岳麓山辛亥先贤遗迹 / 《潇湘晨报》湖湘地理工作室
171	两湖撝英——近代黄兴纪念性构筑解读 / 张天洁、李泽
187	旧新共存和中西交织下的“辛亥时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概论 / 赖德霖
223	图纸及照片资料
477	附录：1894—1937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建筑事件对照表 / 殷力欣、刘江峰
483	编著后记：以建筑的名义传承百年辛亥的不朽精神 / 金磊

辛亥时代建筑概述

殷力欣

引言

本书系“中国近现代建筑经典丛书”第三卷。前二卷为《中山纪念建筑》、《抗战纪念建筑》，分别论述了1866年（孙中山先生出生之年）以来的一个时间延续达百年以上的专题建筑现象——中山纪念建筑；1931年至1945年的特定时代建筑现象——抗战历史建筑。本卷所涉及时间段，主要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创立兴中会——1911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1928年实现共和政体下的全国初步统一”为主线，旁及1937年之前的一些相关建筑事件。

或者可以这样界定本书的选题范围：“抗日战争之前所建造的，从兴中会成立、武昌首义、创立民国至誓师北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等一系列具有历史见证意义的史迹建筑和专题建造的纪念建筑。”

作为有国内外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中青年学者加盟的“建筑文化考察组”，我们编撰这三部书稿，试图以我们近年来对近现代建筑发展史初步探究的阶段性成果，大致脉络明晰地向读者展示1840—1945年这百年历程中，中国建筑业逐渐展露出的复兴端倪和发展轨迹，进而以建筑现象为研究途径，寄寓我们对民族文化未来图景的思索。

适值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日临近，谨以此书表达我们对辛亥革命先贤烈士的深切缅怀。

本卷之所以将1894—1937年命名为“辛亥时代”，是因为这个前后历时四十余年、波折迭起的历史阶段，以1911年武昌起义为中心事件，是经过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四万万同胞的共同努力，终于使现代共和政体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得以确立的关键时期。



图1 1894年——兴中会在华侨
李昌宅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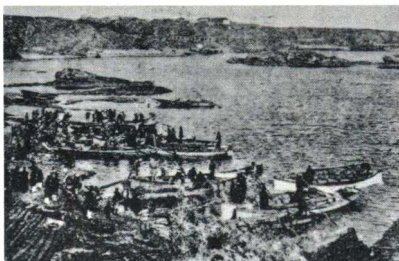


图2 1894年甲午战争——日军在辽东
半岛花园口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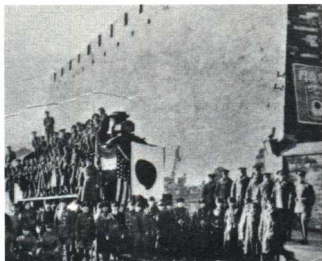


图3 1900年八国联军乘火车兵
临北京城下



图4 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

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的政权更迭，以结束四千年帝王政治、确立民主共和政体为历史表象，而在此表象之下，则包含着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或存或亡、全民族对生存未来的抉择等一系列问题，表现在建筑现象上，则是民族精神与现实生存状况、民族文化习俗与现代生活需求、固有文化心理与西方现代理念等多重元素的多重撞击、多重融合。

目前,我国学术界涉及具体的建筑门类尚无更缜密、明确的科学分类,现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1]、《民用建筑设计通则》^[2]等相关名词解释和现行规范,暂罗列十项基本内容如下:

- ① 宏观调控性质的城市、乡镇规划建设;
- ② 居住建筑(住宅建筑):住宅、公寓等;
- ③ 公共建筑:立法、司法、政府办公用房,工商业、事业、团体、社区办公用房,多功能综合大楼、商场、银行、商务中心,看守所、监狱等;
- ④ 文教科卫建筑: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展览馆、礼堂、体育场馆、科研园区及用房、大中小学校园区及教学楼、医院、康复中心、急救中心、疗养院等;
- ⑤ 交通建筑:汽车客货运站、港口客货运站、铁路客货运站、空港航站楼、地铁站、桥梁等;
- ⑥ 工业建筑:厂房、水利工程等;
- ⑦ 军事建筑:军营、军港、军用机场、军事院校、防御设施等;
- ⑧ 纪念建筑:纪念碑塔亭、纪念馆堂、宗祠、故居、墓园等;
- ⑨ 宗教建筑:文庙、武庙、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及修道院等;^[3]
- ⑩ 园林建筑:公园、私园、游乐场、旅游景点建筑、城市建筑小品等。

应该说,上述十项内容均关联到本卷所要探讨的问题,似乎每一分项都可视为研究建筑与社会问题的基本史料。但囿于时间和目前的考察、研究进展,目前还不具备一一详述的条件。经与其他作者商议,本卷仍如前二卷一样,应用建筑实例考察、建筑风格分析、城市规划格局衍变分析、历史文献考证和口述历史资料采集等方法,而以纪念建筑为基本述论内容。经近一年的努力,分别由陈飞、李媛丽合撰完成《民国之门——湖北咨议局旧址》,周学鹰、鄢增华、苏艳萍合撰完成《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的建筑特色及启示》,彭长歆撰写完成《纪念与继承——辛亥时代广州的纪念物、纪念建筑及空间生产》,潇湘晨报湖湘地理工作室撰写完成《寻访长沙岳麓山辛亥先贤遗迹》,重点述论武汉、广州、南京、长沙等四个与辛亥革命关系最为紧密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辛亥时代纪念建筑遗存概况;全国其他省市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建筑遗存,暂编入附表,以待来日补阙;又由张天洁女士完成一项对黄兴纪念物的专题研究,以弥补以往对孙黄并称的黄兴纪念建筑研究尤嫌不足的缺憾;本卷所收录赖德霖先生的专文《旧新共存和中西交织下的“辛亥时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概论》,打破既定的建筑学分类,撷取文化类型意义上的“礼制建筑”为研究课题,独辟蹊径地阐释了古代中国向现代文明演进的特定时代发展脉络,令人深思中国文化精神在当代的表述问题;而本文所承担的综述任务,则不苛求深入,以能为日后继续研究提供线索为基本目标。

一、清末民初社会思潮与文教事业一瞥

笔者在撰写前两卷综述文章时,都曾大致梳理了所述时代建筑现象所处之特定社会背景,主要着力将建筑现象还原在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形势之中。^[4]这个工作与本书所述内容多有重合,故不再赘论。本文所侧重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形态衍变和社会思潮动态等对建筑活动的影响。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 按:中国儒学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目前尚存争议。按“宗教哲学、宗教情感和宗教仪式”三要素衡量,笔者认为文武庙建筑基本具备了宗教建筑的文化特征,故暂列入宗教建筑行列。

[4] 殷力欣,周学鹰:《中山纪念建筑概说》,载:建筑文化考察组编《中山纪念建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殷力欣,金磊:《抗日战争建筑概说》,载:建筑文化考察组编《抗战纪念建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笔者近年来曾指出：16世纪以前始终维持着高度文明水准的古代中国，之所以在清代迅速衰微直至濒临亡国灭种的险境，原因之一在于清代以来思想的禁锢，使得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致力于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文化再生能力丧失殆尽；^[5]而从另一方面看，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进步势力领导辛亥革命，其历史功勋，不仅仅在于推翻清王朝、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更在于其为振兴民族精神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其为实现民族文化复兴所做出的艰苦的理论探索。

（一）清末民初社会思潮动态

参照《孙中山全集》、《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国学大纲》（钱穆）、《国学概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等著述，1840年以来，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五四运动后逐渐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外，中国思想界有如下值得载入史册的思潮和学说。

① 魏源（1794—1857年）等在坚持儒学基本理念原则的基础上，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海国图志》（1852年）、《书古微》等是其代表作，意在于打破有清一代汉族士大夫阶层拘泥于经学考据而不问政事的局面，开“睁眼看世界”之时代先河。

② 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谭嗣同（1865—1898年）等寻求政治上的“托古改新”。在学理上，这一派维新人士继承清代国学传统，借鉴西方现代思想，而以治儒学“公羊今文之学”为其立论基础。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1891年）、《孔子改制考》（1891年）、《大同书》（1894年）和谭嗣同之《仁学》（1897年）等为其代表作。

③ 严复（1854—1921年）提倡西学、呼吁变法，向国人系统介绍西方现代哲学、政治学成果。译作《天演论》（赫胥黎，1905年）、《法意》（孟德斯鸠，1902年）等在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

④ 章太炎（1869—1936年）作为一代朴学大师，博览儒释道典籍，通晓西方现代哲学，借鉴历史经验，图谋中国之复兴大业。从其《馥书》初版（1899年）到《馥书重订本》（1906年）的思想变化看，大致在康梁变法失败后，他开始放弃对清政府变法维新的幻想，进而主张以汉族为主体力量的中华民族革命。邹容作《革命军》，陈天华作《猛回头》、《警世钟》等，其与章太炎文风迥异，而主张民族革命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

⑤ 孙文学说系孙中山（1866—1925年）先生历经1894年至1924年三十年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而独创。其以客观审视中国历史，理性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人文理念为基础，倡导将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学说改良为具有中国固有文化成分的“五权宪法”，强调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与中国上古民本思想的契合，代表作有《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等。

⑥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胡适之、陈独秀等“文学革命”为先期论题，在学术界倡导“科学与民主”，致力于救国和文化启蒙，对中国传统思想、民族性等进行反思。这两次运动，使鲁迅等大文学家应运而生。鲁迅的文学意义，表面上是反传统（抨击宋明理学尤不遗余力），实则在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呼吁恢复“汉唐文化精神”^[6]。

⑦ 此外，这一时期又有张君勱、丁文江等的“科学与玄学之辩”；梁漱溟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倡导新儒学，有熊十力、冯友兰等响应，亦成颇具影响力的学派。

上述诸多流派，实际上核心问题是两个要素：旧学（国学）与新学（西学）。围绕着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归纳为三种立场：主张因袭固有文化传统；主张采纳西学元素但坚持固有文化为不可动摇的根基；主张彻底摒弃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只有实行彻底的西化才是民族生存的唯一途径。

相比较而言，孙文学说属于第二种立场，因其对中外历史认识之清醒、透彻，立论之高屋建瓴而有别于其他学说，最具说服力。虽

[5] 殷力欣：《杂感——“甲申三百六十年”与“甲辰一百年”》，载《实现——综合艺术评论》，香港，2004年。

[6] 按：有关鲁迅的文学思想，笔者认为，不仅仅要重视《狂人日记》等反传统的作品，还要参阅其涉及传统文化学理分析的篇章，如《汉文学史纲》、《看镜有感》等。

然此学说在当时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无疑是最深刻也最为重要的,至今仍可视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思想宝库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评价孙文学说:

“……有深阔博大之思,足以鼓动全国,以开未来学术思想之新机运者,则为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先生本革命活动之经验,而创‘行易知难’之说,又定‘三民主义’以为救国之方针,其于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智识能力,以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者,尤言之深切而著名。”^[7]

这是很客观中肯的。

笔者近日曾撰《刍议“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文化意义》一文,^[8]认为:

“孙中山一生的社会活动和著述,留给后人这样一个命题: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中国既要学习近现代西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民主自由观念,又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所暗含的人生智慧,正是解决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必要途径。

以他提出的‘五权宪法’为例。孙中山《中国革命史》有言:‘……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之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实现主权在民之实……’^[9]

西方来自洛克、孟德斯鸠等的‘三权分立’说,通常被认为是非常科学的政治理论,而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来自中国传统的两项权利:考试、监察。这似乎是多余的,不够科学的,应该合并并在“行政权”范畴之内。但是,就现在各国形势说,强调这两条,则是极富远见。社会毕竟不是机械,必须有所侧重。就目前世界各地的执政现状来看,侧重强调‘考试权’和‘监察权’,不失为铲除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

本文在此补充一点:孙文学说的意义还在于其真实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理性地处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接触,变文化冲突为文化融合。或者说,孙文学说立足于民族传统,将眼界拓展为不仅要解决中国的生存,不仅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更有进一步图谋中国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胆识,此为辛亥时代中国思想界独具世界意识的学说。



图5 康梁所办《强学报》、《时务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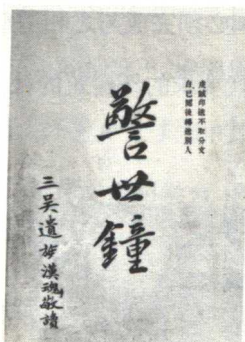


图6 陈天华著作



图7 邹容《革命军》书影



图8 湖北学生所办《汉声》杂志

(二) 清末民初教育、科技事业

仍借助《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国学大纲》(钱穆)等民国史论著为基本资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

[7] 钱穆:《国学概论》,349~350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8] 殷力欣:《刍议“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文化意义》,载《中国建筑文化遗产1》,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9] 《孙中山全集》(7),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①晚清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新式的大中小学教育逐渐取代了传统教育；

②民国之初，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即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912年1月19日），倡导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时代浪潮，体现为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

③虽经袁世凯复辟帝制、倡导拒绝新思想的“尊孔读经”反时代思潮的冲击^[10]，1916年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稍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寅恪教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原则，终于成为中国兴办大学教育的社会共识。

而在科技事业方面，民国之初至抗战前夜，现代科技的发展可列举成果如下：

①数学方面：先后有熊庆来、陈建功、陈省身、华罗庚等相继在微分几何、三角级数、傅里叶级数、堆垒素数等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跻身于世界一流数学家行列；

②物理学方面：吴有训、叶企孙、吴大猷等不仅屡有成果，还形成了高水平的教研体系，为日后杨振宁、李政道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打下了伏笔；

③化学方面：除陈克恢、吴宪、高崇熙、曾昭抡等的研究进展外，更有侯德榜、范旭东合作开创天津塘沽永利制碱厂、黄河化学工业社，将“科学救国”的理想直接应用于“实业救国”的社会实践；

④生物学方面：胡先骕、陈焕镛合撰《中国植物图谱》有“中国植物学发展的扛鼎之作”之誉，而1929年创办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更是享有世界声誉；

⑤其他科技门类：地质学方面有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等，气象学方面有竺可桢等，古生物与古人类学方面有裴文中等，均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现和研究进展，1934年竣工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相当数量的一流人才，至少在亚洲居领先地位。

应当承认，尽管有上述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科技人才，尽管对照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进步历程，应当承认中国当时科技进步势头之迅猛异常，但毕竟与当时的欧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显然仍属草创阶段，仍面临着诸如经济条件的制约、文化观念滞后等诸多困扰。

与上述思想界之百家争鸣和教育、科技之筚路蓝缕相呼应，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克服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战争创伤，使社会生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势，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在这个我们称之为“辛亥时代”的历史阶段，新的共和政体需要真正确立，而发展经济、恢复综合国力的任务也异常艰巨；更为艰难的，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势力渗透和国内旧势力的重重阻碍，新的共和国必须完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的更新。

这也决定了“辛亥时代”的建筑面貌的复杂多样和亟待产生合乎时代要求的新建筑的社会呼声。



图9 清末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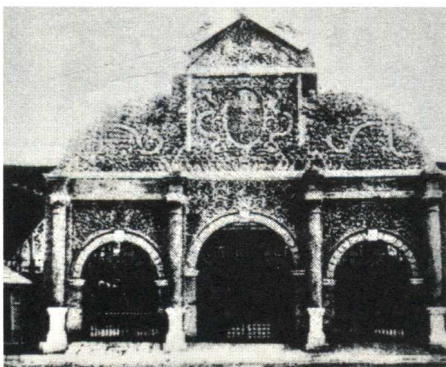


图10 清末北京农业试验场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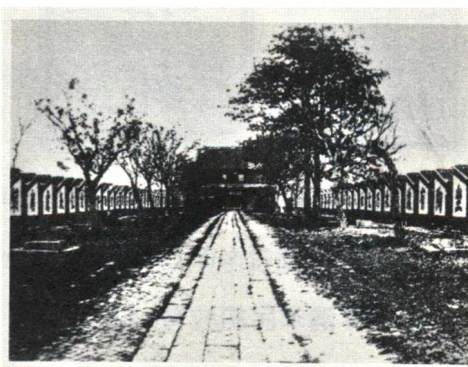


图11 清末广州贡院考棚

[10] 按：此处袁世凯等所倡导的孔子思想，是被后人扭曲的，并不代表儒家学说的本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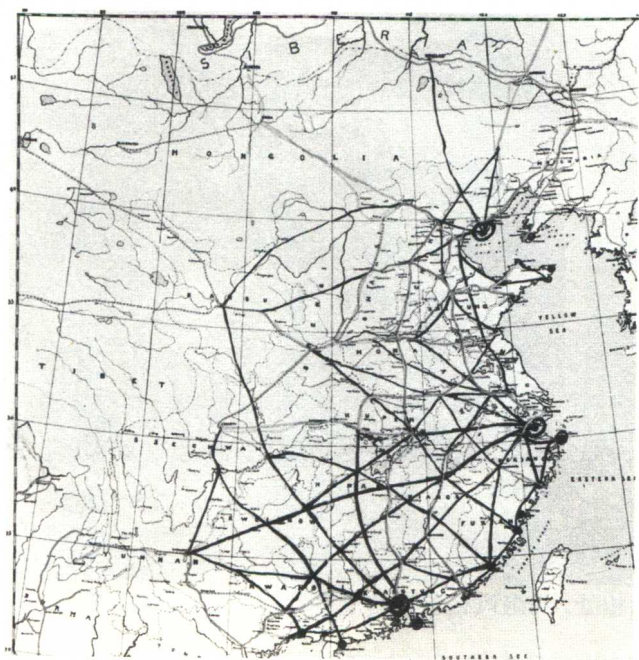


图12 孙中山1913年亲笔勾画的铁路建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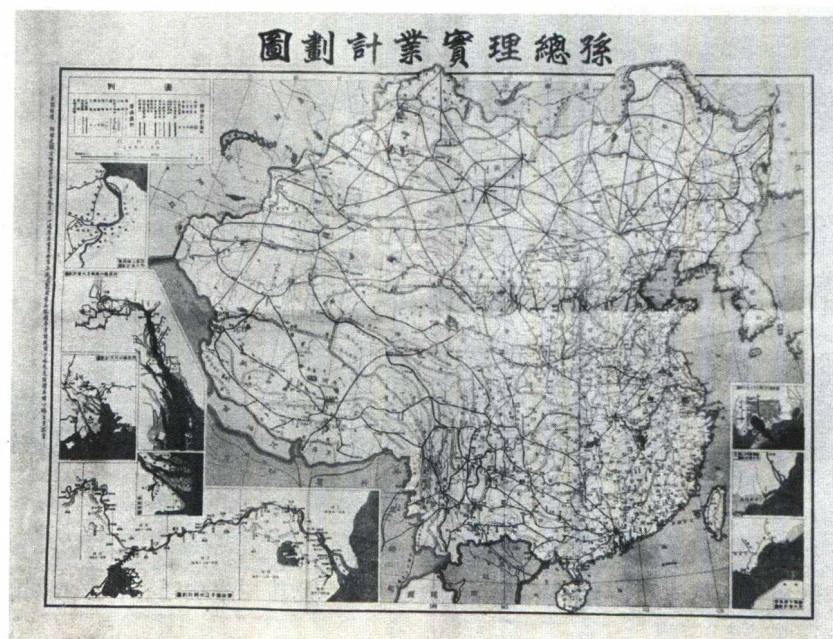


图13 孙中山实业计划图

二、“辛亥时代”建筑背景

(一) 清初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建筑面貌

依据历史文献记录和近年来的实地考察情况分析,以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和材料建造的各类建筑物,虽经社会变迁、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自周秦延续至公元1840年左右,依然覆盖着中国几乎100%的乡村和99%的城镇。这里,所谓城镇建筑面貌的99%,系指西式建筑的引进,其数额很可能实际上尚不足1%。但是,也正是这不足1%的西式建筑,却预示着不久之后的中国社会之巨变。

就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即使没有外来影响,沿袭3 000余年的以木结构为主体的中国建筑体系,也有着自身求变的需求。我们看南宋、元、明、清的建筑结构与技术衍变,大致可感觉到其在建筑规制方面、建筑材料方面之趋于体量的缩小和用材的节俭。这一方面反映了北宋以降综合国力之远逊于汉唐,自然环境变化也使得主要建筑材料(木材)日益短缺;另一方面,也凸显出明清以来人口大幅度剧增所招致的社会压力。故可以说,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建筑也必然要有所变化、有所发展。

同时也应注意到,实际上自古以来华夏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拒绝接受外来影响的民族,但由于自身文化之深厚,很少生硬地照搬外来建筑样式,而是因地制宜地将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相融合。因此,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建筑很早就随着宗教的进入而被中国所接纳,也很早就形成中国化的建筑面貌。

而对于清王朝而言,其特殊性在于:它没有能力完成建筑自身的变化发展(基本沿袭明代建筑风格,只在装饰细节上更加精细,但也趋于繁复琐碎),而对待外来文化影响,则在大政方针上予以拒绝,偶有引进,也仅是猎奇心理,绝无真正的理解,遑论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兹举五例。

1. 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

避暑山庄为集合江南园林、北方民居等元素营建的地处塞北的大型皇家园囿,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雍正、乾隆两代增修,同时在山庄外围修建博采汉藏寺庙建筑之长的普陀宗乘之寺、须弥福寿之寺、安远庙等“外八庙”,费时87年基本竣工。避暑山庄是北京以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夏宫。在建筑上,避暑山庄集民居与园林于一体,风格淡雅,突出亲民形象,而外八庙则融汇汉藏



图14 热河行宫全图



图15 承德须弥福寿之寺全景

等各族宫殿佛寺之特长，强调中央政权的强大及其与蒙藏回等各部族间的和睦相处。两组风格各异的建筑群相互映衬，组合为一组规模更为宏大的建筑群，尽显清代短期的辉煌，虽无艺术上的创新，但也堪称中国古代建筑杰作之一。

2. 北京圆明园

这是这一时期传统风格建筑的另一杰作，同时又包含着早期清廷对西方文化的猎奇。圆明园系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的统称，坐落在北京西郊。它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系清皇室经营150余年的大型皇家宫苑——又一处夏宫。其设计理念与承德避暑山庄大体相似（集合全国各地建筑、园林之精华于一隅），所不同之处，则在于其在园之东北部营建了一处欧式建筑群（含“远瀛观”、“大水法”等多处单体建筑）。此系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等秉承乾隆旨意设计建造，具有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局部采用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当说明的是，郎世宁等并非专业建筑师（至少不是一流的建筑师），此作品虽建材考究、局部雕饰精美，但在柱梁式样、比例的选择上均有失当之处。此大型园囿，既尽展中国古典园林之艺术魅力，又表现了对西方建筑艺术的一知半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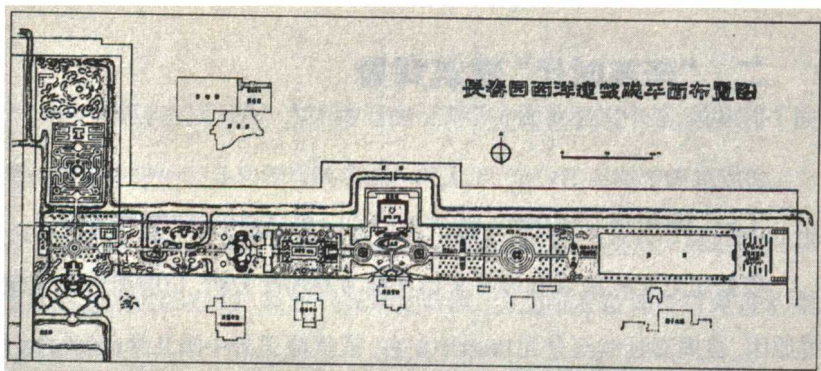


图16 圆明园西洋建筑群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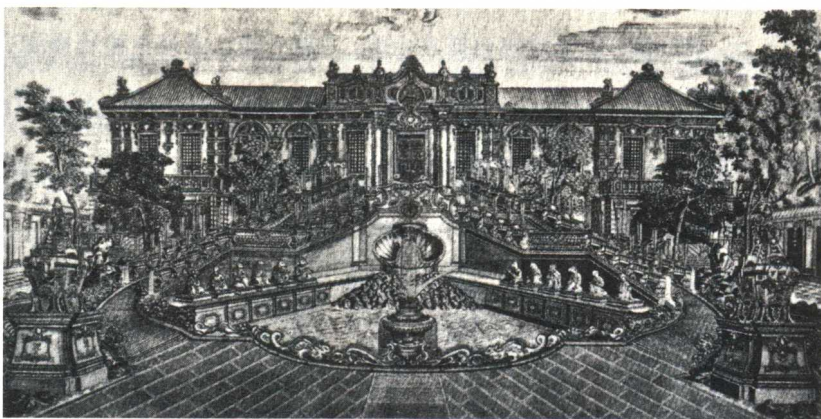


图17 晚清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之一

1860年10月，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洗劫、焚毁。

3. 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

此教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倡导兴建，但现存为1904年重建。据考证，原建筑外观为中国庙堂建筑，内部装修、布置为西洋式，集中反映了利玛窦当年传教的理念——必须将基督教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入清以后，此教堂建筑屡经重建，现为水平一般的巴洛克风格建筑。这个变化过程，似乎是自然灾祸等偶然因素使然，但无形中也说明了有清一代已缺乏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图18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全景



图19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正面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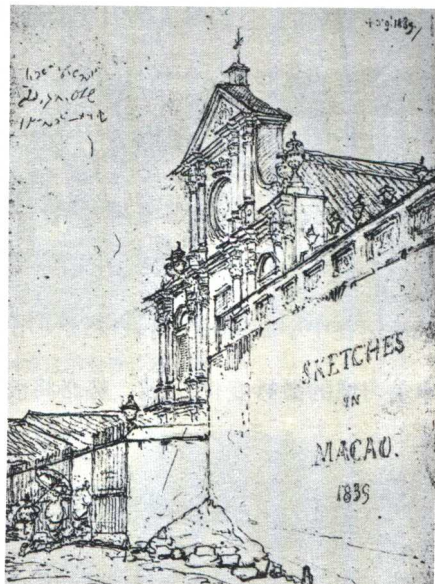


图20 英国画家钱纳利绘澳门圣母玫瑰堂
(1828年重修)

4. 澳门城市建设

自明代中晚期起(1557年),始有葡萄牙人为通商贸易计,开始在澳门逗留、居住。至清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外商很少被允许居住,澳门则成为得到中国政府允许的外商居住地。由此,广州十三行商馆(即“十三夷馆”)成为当时极为罕见的西方建筑群,而澳门除建有大三巴教堂等单体建筑外,更由葡萄牙人营建了具有西式城市规划特色的城市街区。

5. 虎门要塞炮台建筑遗存

此期间最具象征性的建筑,当首推此项建筑遗存。^[11]从清康熙年间起,至鸦片战争前,广东海防以廉州、虎门、长洲、潮州和琼州等五个要塞为基点,构筑了大量的海防工事——炮台。仅扼守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就达13处,至今犹存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遗迹。其中以威远炮台(始称南山威远月台)最为著名。它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位于珠江东岸南山山脚,西向与江心洲之横挡岛炮台互为犄角,素称“金锁铜关”。其平面呈半月形,全长360米,外围墙体高6.2米,宽6.8米,基本以花岗岩条石垒砌;外墙向内,环套两重护墙,形成三重攻防体系。全炮台有券顶之暗炮位40个,各高2.9米,宽4.2米,深6.8米。沿台面另有4个露天炮位,每个炮位两边各设储蓄室1间。暗炮洞后,以2米宽的露天炮巷沟通,炮巷之后即第二重护墙,墙体设有射击孔。炮台第三重内围之后,有官厅1座,神庙3间,兵房12间,药局1座。

仅以其地势之险要和建构之坚固而言,考虑到在1840前后的英军战舰实际火力强度,当时英军并无获胜把握。然而,据史料记载,中国守军相继于1841、1842和1856年三度被英军击败。

可以想见,尽管那一时期中国综合国力确实羸弱,英军确实船坚炮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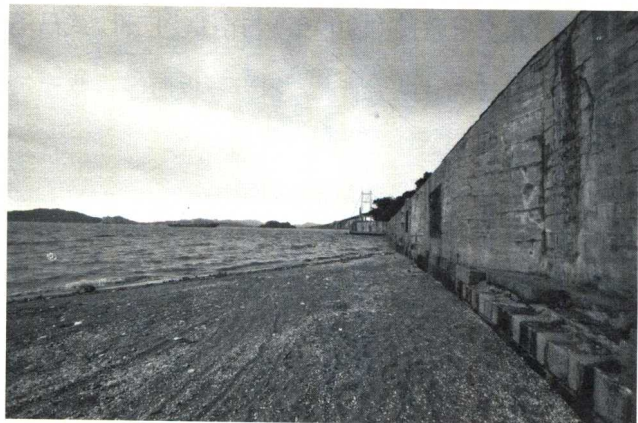


图21 虎门威远炮台厚近7米的外垣



图22 虎门威远炮台三重防御体系鸟瞰

[11] 刘琼林:《珠江口岸炮台建筑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10

但影响战局的,恐怕是人的因素远远大于物质条件。威远炮台之坚固与战事的惨败,正说明了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改变,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改变与民族精神的复兴。

类似的建筑遗存尚有浙江宁波镇海口海防遗址、天津大沽炮台遗址等。

上述选取传统建筑、西式建筑、军事建筑和城市建设等五个实例,虽不足以全面反映“辛亥时代”之前的中国社会风貌,但也不妨为一种窥管,预示着中国建筑开始面临着创始几千年以来在使用功能、建筑材料和审美心理等方面来自西洋的挑战。尽管传统建筑依然在中小城镇和乡村被继续使用,但西式建筑所具有的功能上更适应现代生活的优势,首先在东部沿海新型的工商业城镇引发了审美习惯的微妙变化,之后,势必将波及到内地和村镇。

(二) 1840年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建筑面貌

1840—1911年间,满清政府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等历史事件,不得不考虑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实施一些变革维新,尤以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倡导的洋务运动最为引人注目。此期间,中国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带逐步接受西洋现代文明,在建筑上有如下表现。

①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大连、青岛、哈尔滨等大中型城市,相继建造了成规模的西式建筑群,城市整体面貌渐趋西化。对比传统的北京、西安、苏州等城市的格局,这一变化尤为显著。

②以北京资政院(1909年)与南京、广州、武昌等地所建各省咨议局办公楼为代表,涌现了相当一批西洋古典建筑风格的官署建筑。

③在工业、交通建筑方面,已经出现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若干元素,如此期间建造的山东威海卫海防、福建船政局(即福建马尾造船厂)、湖北枪炮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局(1865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华新纺织局、上海吴淞港、湖北汉阳铁厂(1893年)、南通大生纱厂(1899年)、京张铁路沿线桥梁站房(1905—1909年)、天津铁厂等。

④文教建筑方面,则有武昌两湖书院、长沙楚怡学校、清华学堂、北洋大学堂、上海商务印书馆等,以西式为主,残存若干中国元素。

上述实例,今或存建筑遗址,或有历史文献记录,可大致了解社会变迁所导致的建筑面貌的变化,而传统建筑覆盖100%乡村的局面并没有变化。在中心城市,新的传统风格建筑也没有中断,表现如下。

①广州陈家祠堂。原称陈氏书院,位于今广州市中山七路。陈家祠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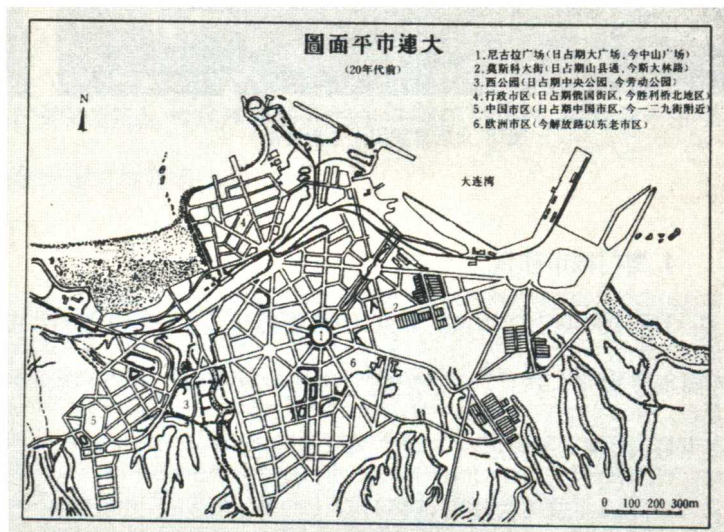


图23 沙俄时期大连市规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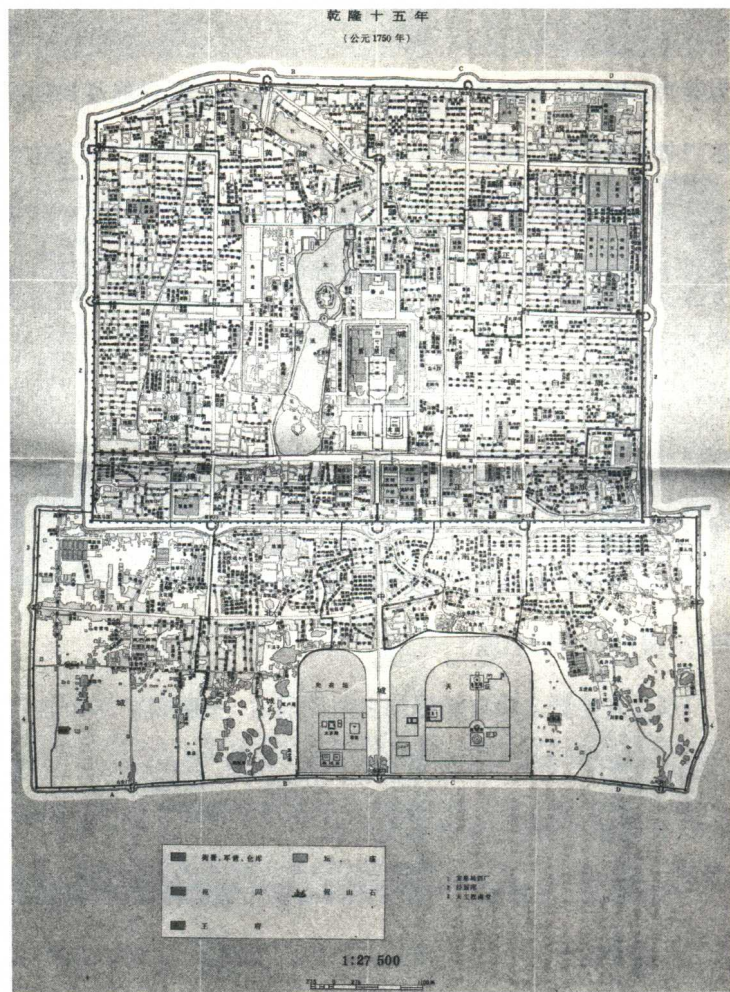


图24 清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图(1850年)